

因素，需要置於同一時段區域事件、社會關係、個人作為和民眾心理等交互作用中進行審察。

李丹婕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覃延佳，《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建構：廣西上林師公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339頁。

20世紀80年代，華琛(James L. Watson)開始從民間宗教探討中國社會歷史文化過程的研究。華琛提出神明的「標準化」作為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化整合系統，他認為這個系統強調的是神明的象徵和儀式實踐(行為正確)而非信仰。正是象徵與實踐這一結構的模糊性，為中國晚期帝國文化的統一性與差異性提供了空間。隨後許多歷史學者、人類學者加入了這場討論，對華琛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和修正。覃延佳的《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建構：廣西上林師公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一書就是由此出發，通過考察廣西上林地區的師公——地方儀式專家——的能動過程，開展歷史人類學研究。通過對廣西上林地區師公的神靈譜系、儀式過程和儀式文本的討論，解釋師公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構。

在導論部份，作者從中國宗教與社會結構性問題、道教的儀式研究取向和民間儀式傳統的正統化與多元性這三個方面對前人的研究做了詳實的梳理，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從特定儀式專家的儀式及其文本來分析其儀式傳統，尋找儀式專家自我區分的內在邏輯，從而從更加多維的視角來闡釋民間儀式專家之儀式傳統在區域上的相對統一性與多元性。」(頁11)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借助社會文化史學的反思視角，通過田野調查收集資料，將師公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放入具體的歷史情境和儀式情境中去理解，並發掘其與地方文化的關係。作者還介紹了撰寫本書的基本思路、所運用的材料及簡單的分類，以及全書每個篇章的內容簡介。

在第一章，作者選取了在上林地區具有重要地理意義的西燕鎮四個影響較大的師公班作為對象，對他們自清末以來的師承譜系進行了分析，比較了他們之間的異同，追溯師公進入這一區域的歷史，闡述不同師公班子之間的傳承與重構，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師公認同與區分。最後，作者還將師公

這一儀式專家放入其所在的宗教市場中進行分析，作者通過論述師公在其所在的宗教市場中所扮演的儀式角色及其與其他儀式專家——道士、仙婆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對師公在當地宗教市場中的定位和師公的自我認同進行了分析。

在第二章，作者認為，研究廣西上林地區師公應該回到儀式現場，從其自身的解釋去理解其宗教思想來源及其神靈譜系。作者以被視為師公信仰主神的唐、葛、周三元教主為例，通過對道教文獻、宗教科儀書、師公唱本這三類文獻資料進行分析，論述了三位神明如何從道教守護天門的三真君轉變成為師公主神的三元教主，表明了師公作為儀式專家如何通過其地方化的敘事對道教神祇進行建構。緊接着作者又通過對師公的請聖科儀和唱本的分析，梳理出師公的神靈譜系，進而強調師公的神靈譜系是一個歷史建構的過程。之後作者還通過師公唱本中對神靈形象的敘述和其對師教之形塑，來說明師公在儀式生活中對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通過這種方式來強調其在宗教市場中與僧、道的區別。

在第三章，作者主要從師公的具體儀式過程去探討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同時討論在地方宗教環境中師公與道士的競爭合作關係對其儀式建構的影響。作者考察師公的戒度儀式，對儀式過程中的唱本進行功能性分析，闡述了師公戒度儀式對民間信仰的傳承和對其師道的承繼。同時作者還將師公的戒度儀式視為人生禮儀在村落中的一種重要展演方式，起到了展示其儀式能力的作用（頁140）。在師公所從事的喪葬儀式中，作者通過對古登師公班和西燕師公班進行具體的描述和對比，闡述了道士的存在對兩地師公班儀式的影響。最後作者通過師公在社區儀式「做社」中的角色轉換，以及在「做社」和「做齋」儀式中所扮演的不同儀式角色，討論師公在當地宗教市場中的定位問題。

在第四章，作者試圖從文本的功能與意義兩個方面對師公使用的宗教文書進行研究。首先，作者對師公所採用的宗教文書按照功能和師公自身的理解進行了分類：行儀過程中唱誦的唱本和「寬」書；師公對道士儀式文本採借而來的科儀書、文字式；作為師法傳承重要文本的金書。在這之後作者依據這種分類對文本進行分析，討論其在具體儀式情境中的使用情況（頁178）。作者在文章中對文本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既與道士文本相對比，又與具體的儀式過程分析相結合，在情境與比較中理解文本，對師公的儀式承繼與建構做出了詳細的闡釋。

在第五章，作者認為，基於多元的社會文化背景產生並傳承的宗教文書

呈現出了一種地方社會建構自身文化的自覺方式（頁209）。因此作者試圖通過師公這一地方的儀式專家，闡明其不僅通過儀式和儀式文本承繼與建構了自身儀式，同時也參與傳播和建構了其所在地區的地方文化。作者以師公儀式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互動方式——「做歡」為例，分析了師公在其中的展演，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用「寬」書的內容所體現的地方歷史與文化，由此展現出師公作為一位地方文化的書寫與傳播者的角色。作者從師公唱本中對信仰世界與儀式空間的敘述進行分析，試圖透過地方信仰世界去理解國家力量在認知層面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以及地方主體能動地自我認知。最後，作者認為師公作為儀式中的中介者，既是儀式專家又是鄉民，既是地方教化的代言人又是地方文化的傳播者，他們運用其在地方宗教市場中的能動性參與了地方文化的傳承與建構。

在結語部份，作者從兩個方面對全書做了總結：一是師公儀式傳統統一性與多元性的構成要素，一是師公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的互相建構。作者認為，廣西上林西燕鎮一帶的師公儀式傳統應該追溯到明末清初。由於村落宗教市場的競爭，一方面師公需要對其譜系傳承進行維護，另一方面還需要根據實際需求適時地對道士的文本進行採借與重構，從而形成了師公儀式傳統的統一性與多元性。因此，宗教市場對於師公的儀式傳統具有不可估量的塑造作用。師公為了在宗教市場中獲益，需要在儀式過程中不斷與民眾互動。這一過程使得其儀式傳統地方化，然而在互動的過程中其宗教知識又影響了與其互動之民眾。因此師公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過程是與地方文化的建構過程互為表裡、相互促進的（頁245）。作者提出，基於師公儀式傳統進行的「結構—過程」探討，可以作為理解處於國家邊緣的地方人群之社會文化與歷史的一個有效切入點（頁250）。

作者在社會文化史學家對之前中國宗教研究反思的基礎上，對師公這一儀式實踐主體進行研究，分析了師公的儀式過程和儀式文本傳統，並將師公的儀式放入地方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情境中進行解讀，尋找師公自我認同的內在邏輯，以闡釋師公的儀式傳統在區域內的相對統一性與多元性。在作者的研究中，一方面做了歷史性考察，將師公儀式的象徵性分析與大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相結合，描繪出師公儀式承繼與建構的歷史脈絡；另一方面，注重考察在具體的儀式過程中，師公作為實踐主體的能動作用，呈現了師公在其儀式承繼與建構過程的創造性作用。這兩方面的結合，得以理解作者提出的師公作為一個儀式專家，既是文化展演的主體又是文化展演的吸收體，其儀式傳統呈現出了地方文化建構的一體兩面性（頁247）。

作者雖然以師公這一儀式專家作為主體進行儀式研究，但並不滿足於從傳統的內部視角來分析師公的自我認同與區分，以及師公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作者試圖從外部視角來分析師公作為一個儀式專家，在這一地區的定位及其儀式傳統的傳承與變遷問題。作者在書中的多個章節都提到「宗教市場」這一概念，也多次強調正是由於宗教市場的競爭，師公需要對其在社區與儀式中的定位有別於道士。這一外部視角對理解師公的自我認同與其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確實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雖然翻譯、整理了大量用壯語土俗字書寫的宗教文書，但是除此之外，師公手上也應有漢字書寫的西南官話的宗教文書。在儀式承繼與建構的文本視角分析中，作者僅從儀式功用與師公自身的理解出發進行分類分析，對於由漢字書寫的宗教文書與由壯語書寫的宗教文書，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作者並沒有展開進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僅是理解師公儀式承繼與建構的一個視角，還是一個可以上升到反映國家力量與地方社會關係的重要視角。

對宗教市場這一概念，作者在全書多個章節都有提及，作者在結語部份也強調了宗教市場是影響師公儀式傳承與建構的重要影響因素（頁245）。然而，對宗教市場的敘述與分析都太過於薄弱，作者雖有專門的一節提到了宗教市場，但僅是對村落中的其他儀式專家與師公之間的關係做了介紹與分析。關於如何定義這個宗教市場，宗教市場在地方社會中的形貌及其與地方文化之間的關係這些背景並未解釋清楚。總之，宗教市場是作者理解師公及其儀式的傳承與建構的一個重要視角，也是全書的一個重要論點，但是其論述頗為牽強與模糊。

作者對師公的宗教文書和許多道教的歷史文獻做了深入細緻的梳理與分析，也對師公的神靈譜系做了一個基本的溯源和傳承變遷的介紹。但是，作者並沒有對師公這一民間信仰與道教之間的關係進行系統的論述，更沒有將其上升到中國文化的一統性與多元性，從而實現與大家的對話。

作者的研究視角，是希望將師公這一地方儀式專家的儀式過程與儀式文本放入地方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歷史情境中進行解讀，以期使讀者能夠通過作者的解釋，達到理解師公儀式背後的邏輯與動因的目的。作者作為有着歷史學背景的人類學家，在歷史文獻的梳理方面有很大貢獻，但是在對當地群體自身的文化圖式和思維模式的論述方面有所缺失。如果作者能夠對當地的社會文化做一個全景式的概述，並對其所研究區域宗教體系的總體概況做出介紹，那麼讀者便可以更好的理解地方文化情境，也能更好的理解作者想要論

述的師公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之間相互建構這一結論。

綜上所述，這本書試圖從師公這一特定儀式專家作為實踐的主體出發，通過分析其儀式過程與儀式文本，來闡述師公儀式傳統的承繼與建構，以及師公儀式傳統與地方文化的相互建構。作者在本書的導論和不少章節中，多次提到傳統中國文化統一性與地方文化多樣性問題，但並沒有就此展開專門論述，如果本書能夠在上述命題中所有提升，那麼其學術價值將更上一層樓。

杜樹海、鍾琳

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

丁蕾，《從私藏到公共展覽：民國時期廣州的博物館和展覽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415頁。

近年來，都市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國內史學家的關注。丁蕾《從私藏到公共展覽：民國時期廣州的博物館和展覽會》一書從民國時期博物館和展覽會中尋找近代都市文化形成的源頭，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嘗試。該書是作者在其導師程美寶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出版，得到廣東省高層次人才項目「全球視野下的嶺南社會與文化」項目的資助。

是書從展覽最基本的元素——「物」出發，回答在近代不同種類的物品如何從私藏走向公共視野，也即「從私藏到公共展覽」的過程。透過分析物品的展示方式及其象徵意義，作者嘗試探討民國時期的公共展覽如何在政府、學者等力量的共同推動下，通過公共展覽建構區域形象。作者認為，重建地域形象的塑造過程，有助於理解近現代中國形象和表述的形成。

在第一、二章，作者回溯了民國時期物品展示的歷史脈絡以及近代西方知識體系傳入後的新趨勢，指出這一時期公共展覽中的「展品」，既有傳統收藏脈絡下的舊物，也有新知識體系帶來的「新物」，諸如民俗物件、考古出土物等。物品能否出現在展覽場上，由其背後的收藏者的學術脈絡以及展覽組織者的社關網絡決定。

第三、四章，以廣州市立博物院、廣州市第一次展覽會和廣東文物展為例，探討公共展覽與地方形象建構的關係。1929年成立的廣州市立博物院是廣州市政府主辦的公共展覽機構，因此其陳列內容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把